

# 从年谱、本事等看宋人的诗文接受意识

薛宝生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宋人对前人(包括本朝前辈)诗文的接受,除了表现在师法某些作家作品进行创作之外,还表现在对前人诗文集的整理上。在诗文整理过程中,出于知人论世的目的,宋人或积极编撰年谱、本事类著作,或对诗文进行编年,或注明典故出处。在这些编纂、整理工作中,明显表现出宋人识源辨流、由诗意直观向诗人之意回归及“上下相维,合为具体”的诗文接受意识。

[关键词]年谱;本事;诗歌接受意识;编年诗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3)02-0124-05

年谱、本事相对于由作者设定并随着作品的成形而固定的隐性因素(如文本的结构、上下文语境以及词句的经营等)来说,是外在呈现的材料,或者说是“文本的外在背景”,因为其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最直观形式仅是书面文字。文人年谱确立成形于宋代,在编排上,以作者所处时代的帝王禅让、世袭及位内改元的情况(即年号的更易)为纲,以作者生命的起讫为区间来记录作者的行藏出处或创作情况,含跨数年到数十年不等。“如果谱主是以诗人或文人的身份被认知的话,那么年谱就有了作为文学作品历史背景的意义。”<sup>[1](P.230)</sup>“本事”二字出于唐代孟棻的《本事诗》,是一种蕴藏在创作背后、有助于揭示作者创作原意的材料。本事具有故事性,折射出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当然,语典出处也称为本事<sup>①</sup>,知词句的化用出处,亦有助于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及作品意义。年谱、本事等主要由研究者整理完成(也有一些作者于创作时透露本事,或是自为年谱的情况<sup>②</sup>),具有提供作者出处、著作情况、创作的时代背景等功用。虽然这一切主要集中于知人论世,为阐释作者创作本意提供最基础的背景资料,但也透露出宋人对于前代作家及本朝前辈诗文的接受意识。

[收稿日期]2012-10-10

[作者简介]薛宝生,男,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一、“识源辨流、举纲张目”

宋人“识源辨流、举纲张目”的意识主要体现在年谱与编年诗的编纂中,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汉代郑玄谱《诗》。郑玄《诗谱序》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用,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夫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sup>[2](P.9)</sup>循上下而知源流清浊,这是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在《诗》学中的应用,即不孤立地看待《诗》篇的存在,主张把它放在一个有上有下的完整的历史流程中去审查,从而观其世风的清与浊、诗风的正与变。举纲张目的本意是提起渔网上的大绳,每个网格就自然张开了,在此指把每个时期的《诗》篇以时间为纲串连起来,线索就清楚了,于《诗》的接受理解,便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处郑玄虽就《诗谱》而言,但在宋

① 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三)云“范文正微时冒朱姓,后归本宗。《启》:‘志在逃秦,入境遂称夫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夫陶朱。’用范蠡、范雎是当家家本事。”《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第31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年谱的编纂者分为自撰、友生及弟子门人所撰、后人补作或改作、纯考证类的远古哲人年表四种情况。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351~361页。

人由《诗》及诗的论诗模式中,却具有普遍意义。魏了翁云“谱三百五篇《诗》自郑氏,不尽用郑谱而又别为谱自国朝欧阳氏。考世次以定先后,审正变以观治忽,谱之作不但为《诗》而已,抑亦当代之编年也……杜少陵所为号诗史者,以其不特模写物象,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前之为谱者有吕氏,后之为谱者有蔡氏,所以忠于少陵者多矣。”<sup>[3]</sup>自欧阳氏对郑玄《诗谱》行承变破立之后,吕大防、蔡兴宗遂在对杜甫(诗)的编年中,实现了由《诗》及诗的承袭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了宋人“识源辨流、举纲张目”的意识。

吕大防《杜子美年谱跋》云“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sup>[4]</sup>吕大防对年谱价值的认识是从两个层次展开的,即在“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后,再参照文本,才可见其“切叹之意”,“考其辞力”变化,这是一个由编排次序→时→事→义的认识过程。在浅层次上,将作者“出处之岁月”以历史的、时间的逻辑加以“次第”(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主要是反映其行藏出处的宦海沉浮史),使其个人史的流程变得清晰。于是,作家生命不同阶段的“为文之时”(即创作的具体时代背景)也变得清晰起来,此即是纲举目张意识的体现。在深层次上,把作品与业已清晰的“为文之时”结合起来进行深层次考察,蕴含在作品中的“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即作者感时伤世的原因及论世寄意的具体情况也由此显露出来。当这一步也告终的时候,作者行年与作品的对应关系也便确立起来,随之作者不同创作时期的文风变化也就跃然于目,此即识源辨流意识的体现。

吕大防的主张具有代表性,宋人在年谱及编年诗的编撰中多体现出识源辨流意识。文安礼《柳文年谱后序》云“予以先生文集与唐史参考,为时年谱,庶可知其出处,与夫作文之岁月,得以究其辞力之如何也。”<sup>[5]</sup>陈晔《古灵先生年谱跋》云“家君重刊先正密学遗文于赣之郡斋,俾晔次第年谱以冠之,庶几生平游宦岁月之先后,与夫壮志晚节,诗文之辞力,晓然可见。”<sup>[6]</sup>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跋》云“文有年谱,犹史之有年表,盖不可以阔……凡所记事,必广援引以为之证,非惟有益于其文,至于忠义慷慨之节,终始出处之致,历历可见,如以灯取影,以镜求形,有不容遁匿

者。”<sup>[7]</sup>以上诸人皆出于知人论世的目的,主张将作品植入个人史中,使个人史与“为文之时”相照应,从而考察其作品风格因生命阶段的不同经历而呈现出的变化,凸显出强烈的“识源辨流、举纲张目”意识,以此为手段,便可以达到“以灯取影,以镜求形”的效果,其诗风的正与变、世风的清与浊“不容遁匿”。李伯记《杜工部集序》云“杜子美诗,古今绝唱也。旧集古律异卷、编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处及少壮老成之作。”<sup>[8]</sup>由此可见,宋人的诗文接受意识是尚编次、注重作品本身的历史性的,体现的正是一种明源流、识正变的意识。如果作品没有编次或失序,便不能达到上述效果。

## 二、由诗意直观向诗人之意回归

诗意直观指读者不借助任何注释性材料,从文字中读出的直接意义。诗人之意,即诗人由于外物所感而情动于中所要表达的原意。一方面,由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使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差距,正如刘勰所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sup>[9]</sup>;另一方面,由于不明诗人作诗时的本事,再加上读者“郢书燕说”、“郑璞周鼠”式的误读,使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差距。而宋人对诗接受正凸显了由诗意直观向诗人之意回归的意识,这主要受当时经学领域疑古思潮的影响,自欧阳修《诗本义》、《诗解统序》等著作问世,疑古逐渐成了一种思想潮流,宋人质疑汉儒经解,试图越过汉儒直接与经典对话,以寻其本义。以《诗》及诗的传统对宋人接受前代作家及本朝前辈作品的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本事类著作的编纂及语典出处的注释中,颇能体现宋人寻求本义——由诗意直观向诗人之意回归的意识。

本事类著作的编纂始于唐代孟棻《本事诗》。孟棻以后,五代中就有续书,至宋代则有《本事集》、《本事曲》、《唐诗纪事》等等,而诗话、笔记记载作品本事的情况就更加常见了。孟棻自述其编撰《本事诗》的目的云“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sup>[10]</sup>诗人因事感发咏歌,并于咏歌中寄托自己的情思(即作者本意),而这种情思只有作者自己才清楚,如果不用引发作者咏歌行为的本事加以阐发说明,读者便不能得作者本意。也就是说,本事提供了与作者当初写作紧密相关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庶几可得作者之意,读者因本

事而明白诗人产生“怨思悲愁”之情的诱因,进而才能理解诗人寄托在文本中的隐义。

宋人对本事的关注基本上沿袭了孟棻的思路,尤其注重对作者本意的追求,诸多诗话、随笔中有关作品本事的编撰往往透露了诗人的创作意图,以便后人理解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兹举几例以明。刘攽《中山诗话》载“赵少师初在涟水守馆,不数年后,以学士知涟水,继来者名其堂为豹隐。曼卿有诗曰‘熊非清渭逢何暮?龙卧南阳去不还。年少官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谈间。’后莫偕者。”<sup>[11] [P. 295]</sup>非刘攽明曼卿作诗的本事,几欲使人误以为此诗是曼卿自况。洪迈《容斋随笔》载“张籍在他镇幕府,郾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何不相逢未嫁时?’陈无己为颖州教授,东坡领郡,而陈赋《妾薄命》篇……全用籍意。或谓无己轻坡公,是不然。前此无己官于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无己越境见之于宋都,坐是免归,故其诗云:‘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昔为马首衔,今为禁门键。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其尊敬之尽矣。薄命拟况,盖不忍师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sup>[12] [P. 492]</sup>洪迈先是以张籍作《节妇吟》的本事明张籍作诗之本意,此诗乃是作者取喻以却聘,为政治寄托诗。继而指出陈师道用意出处的本事及陈师道用张籍诗的本意,又以陈师道作《妾薄命》的本事明陈师道尊师而非轻师的本意。在宋人诗话及笔记中,关于此种以本事解释作者之意的例子比比皆是,兹不赘举!

此外,在诗文的注解中,“论诗及事”意识也相当明显。任渊《后山诗注目录序》云“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此诗注所以作也。”<sup>[13]</sup>许尹《黄陈诗集注序》云“三江任君子渊,博极群书,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诗为之注解,且为原本立意始末,以晓学者。非若世之笺训,但能标题出处而已。”<sup>[14]</sup>《四库全书总目·后山诗注》云“渊生南北宋间,去元祐诸人不远,佚文遗迹,往往而存,即同时所与周旋者,亦一一能知始末。故所注排比年月,钩稽事实,多能得作者本意。”<sup>[15] [P. 1329]</sup>任渊作注本着“窥其(诗人)用意深处”的意识,许尹也认为任渊持“原本立意始末”的意识,《四库全书总目·后山诗注》也认为任渊“能得作者本意”,三者虽用词不同,但用意却毫无二致,皆是本着探求作者本意的意识,并不满足“标题出处”等诗意直观。

宋人看重本事的价值,以为通过本事就可以得作者之本意,若无本事则意义不可确知。故《四库全书总目》对任渊注明陈师道诗本事的做法加以肯定。“然师道诗得自苦吟,运思幽僻,猝不易明……其言外寄托,亦难以臆揣。如《送郭概四川提刑》诗之‘功名何用多,莫为分外虑’;《送杜纯陕西转漕》诗之‘谁能留渴须远井’……非渊一一详其本事,今据文读之,有茫不知为何语者。”<sup>[15] [P. 1329]</sup>此处以具体的事实肯定了任渊的努力,指出了本事对于文本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作者苦吟、寄托而得之诗,本事尤可以发读者于迷茫,为读者提供头绪,进而理解作者本意,这即是本事的阐释学价值所在。宋人寄意于诗人本意,故而特重本事。

### 三、“上下相维,合为具体”

宋人“上下相维,合为具体”的意识是基于年谱、本事等文本外在背景的局限性产生的,而外在背景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其本身纪事的可靠性和对于文本阐释的间接性。就可靠性而言,本事滥觞于笔记小说,具有诗话、史传等特点,故一身兼多体<sup>①</sup>,皆似之而非也。有作伪者,如《九家集注杜诗》卷首郭知达序曰“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抵牾。至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sup>[16]</sup>有猎奇而荒诞不经者,如《四库总目》在《华阳集》一条诟病《本事诗》云“《本事诗》又载况《红叶题诗》事,尤属不经。其所题诗亦猥鄙不足传,皆好事者为之也。”<sup>[15] [P. 1286]</sup>亦有考证不精者,如厉鹗《宋诗纪事序》所举“以为宋人考本朝尚有未当:如胡元任不知郑文宝仲贤为一人;注苏轼者不知欧阳闢非文忠之族;方万里不知薛道祖非昂之子。”<sup>[17] [P. 1]</sup>因为以上诸种情况容易导致读者对诗意的歪曲、误读,反而徒增了文本阐释的工序,使本事对于文本阐释的可靠性打了折扣。

<sup>①</sup>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云“《本事诗》是诗话的前身,其来源于则与笔记小说有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540页。章学诚《文史通义》云“自孟棻《本事诗》出(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於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於经部之小学矣(《尔雅》训诂类也)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於子部之杂家矣(此二条,宋人以后较多)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诗教有益而已矣。”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559页。由以上线索可知,本事兼具诗话、笔记小说、传记、训诂之书、杂家五种性质,故认为其一书兼多体。

年谱编纂包含了编纂者对材料的判断取舍,因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编纂者的识力又有深浅之别,故其所作年谱的可靠性就有待进一步考察。张綖《杜工部诗通》卷一云:“然编年非公自订,不过后人以诗意而附之耳。夫史传编年,已有失其真而不可尽信者,又况数百年之后,徒因诗意以求合史传之年耶?”<sup>[18] (P. 345)</sup>此论良是。

就间接性而言,呈现于读者眼前的本事只是一些关于事件如何发生的文字记载,无法让作者的具体写作过程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当读者接触到本事时,这些文字记载才会转化成一个故事。至于这个作为背景的故事如何刺激作者,使其心灵感荡,又如何使其选择恰当的词表达内心的感荡之意,则需要读者自己去思索判定。年谱年月次序式的编排并不能使读者直接理解文本的意义,“因为即使知道诗人在某年某月写了哪些诗,也并不意味着晓得诗人为什么而写那些诗”<sup>[1] (P. 236)</sup>。也就是说,年谱对于文本阐释的意义是间接的,它更多地提供了阐释的眼光及文本阐释的方法。

对于怎样消解基于外背景在阐释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宋人作了比较有益的尝试,即把年谱、本事与诗的编纂结合起来,将诗人作诗的年月与年谱的行年一一对应,于年谱主人生涯记录的某年中编入该年所作之诗,再将本事等作诗的背景资料编入具体的诗文,这种三而为一的编纂在宋人对作品的编纂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体现了“上下相维,合为具体”的诗歌接受意识,即把“文本的外在背景”与“内在的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如任渊对黄庭坚诗集的编纂,先记山谷某年行藏出处,再列该年所作诗之题名于下,若有本事者,则并录其事于题名下,兹略举一例以明之。

元符三年庚辰。是岁山谷在戎州,正月徽考即位。五月复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山谷既得放还,以江涨未能下峡。七月自戎舟行,省其姑于青神。十月改奉议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十一月自青神复还戎,十二月发戎州,过江安,为石信道挽留,遂作岁于此。(以上纪山谷某年行藏出处,是年谱的组成部分——笔者注)

《赠知命弟离戎州》

……

《谢应之》即史应之也。应之往岁见山谷于戎,尝有诗戏之。此篇当是应之自眉来青神,再见山谷,叙述往事,故有“去年席上蛟龙

语,未委先生记得无”之句。山谷在青神,有《与眉山程信孺帖》云:“应之在馆,时接从容,宾主相乐也。是岁来自眉山可知。”<sup>[14]</sup>(书名号为某诗的题名;书名号后为有关该诗本事的记录——笔者注)

任渊将年谱、本事与诗的编纂合一,使“文本的外在背景”与“内在环境”在形式上结成一体。故《四库全书总目》云:“任渊、史容注《黄庭坚集》,於作诗本事及年月俱一一详核,故为善本。”<sup>[15] (P. 1525)</sup>“任注《内集》,史注《外集》,其大纲皆系於目录每条之下。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此断非数百年后以意编年者所能为,何可轻也!”<sup>[15] (P. 1329)</sup>

#### 四、接受过程的最终完成

宋人的诗文接受体现出理性思考的意识,表明宋人并不执守于“以意逆志”式的“文本内环境”研究,而是认识到了“文本外在背景”对于研究前人诗文的重要性,也即意识到“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结合的重要性。这种结合本着最大限度地理解或者还原作者的本意,但是,这只是局限性的暂时消解。因为“文本外在背景”与“内部环境”合一的整体只是一堆意不自显、还需因人而彰的文字记载。只有当读者以理性的精神去介入、把握这个整体时,才能完成诗文阐释与接受的全过程,才能实现局限性的最终消解。

为此,读者需要借助一些方法,才能正确把握文本意义,最终完成阐释、接受的全过程,而“涵咏”、“深观”<sup>①</sup>正是这样一些方法,清人或称做“沉潜”<sup>②</sup>。“涵咏”、“深观”、“沉潜”等意在祛除先入为主的意识,用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去想古人所想、为古人所为。但是,这种“想”和“为”不是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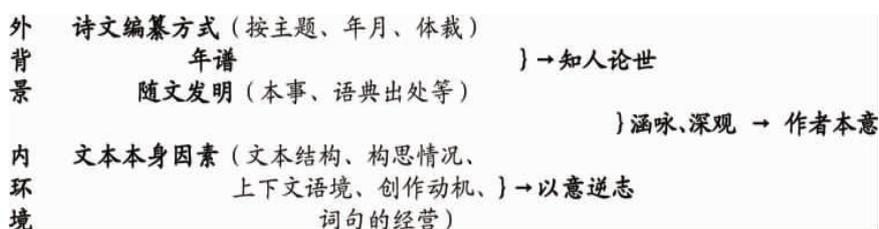
① 《苏轼文集》(卷二)云:“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51页。罗大经《鹤林玉露》云:“杜少陵绝句云……于此而涵咏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149页。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云:“方岳称苏轼的读书方法是‘潜窥沉玩,实领悬悟’。陆九渊自称读书方法是‘沉涵熟复,切己致思’。朱熹告诫后学读书要‘虚心涵咏,切己省察’。”(第217页)

② 仇兆鳌《杜诗详注序》(卷首)云:“是故注杜者,必反覆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馀悲,悄乎有馀思也。”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

读者为理解文本之意而刻意模仿诗人写作时所处的场景和心境,而是在不自觉地进行某种行为时所处的场景、情势使读者突然联想到诗人的作品,然后恍然悟得诗人写诗的情景,进而明白其义。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载“熙宁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参知政事拜相……独与余坐于西庑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一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元丰己未,公已谢事,为会灵观使,居金陵白下门外。余谒公,公欣然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是时,虽无霜雪,而虚窗松竹皆如诗中之景。”<sup>[19]</sup> [P.323] 此处,王安石作诗自有其心中、眼中

的情景,而观者当时疑惑不解,直至身临钟山寺,不经意间眼触其景,涵之于心的疑惑得以重起,并因此情景而顿时消解。熙宁庚戌之感到元丰己未乃解,其间或有时隐时现、反复沉潜者,却在不自觉间以“心解”的方式达到了还原作者本意及文本原意的目的。

当年谱、本事与文本合而为一,“文本的外在背景”与“文本的内环境”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呈现于读者眼前,读者以“涵咏”、“深观”的理性思考方式介入,文本的意义也因此而变得清晰,作者的本意最终得以显现。故而,宋人的诗文接受意识可以表示为下图。



##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年谱、本事类作品的编纂体现了宋人从识源辨流向诗人之意回归,最终走向合为具体的诗歌接受意识,标志着宋人诗歌接受观念的成熟。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凡例》云“诗既定编,注亦尽善,本诗本事,血脉贯通,上下相维,合为具体,有咸臻治安之思,相与乐成之意。”<sup>[20]</sup> [P.1] 当“文本的内环境”与“外在背景”结成一体,读者“心解”、“心注”的过程宣告完成的时候,文本之义、作者之意、读者之意达到了理想的统一状态,三者“相与乐成”,外在背景的局限性得以最终消解,阐释过程宣告结束,接受的过程也最终得以完成。

### 【参考文献】

- [1]周裕锴.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2]孔颖达等.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标点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3]魏了翁.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M]. 四部丛刊本.
- [4]分门集注杜工部诗[Z]. 四部丛刊本.
- [5]文安礼. 柳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本·第011册)[Z]. 北京: 北京图书馆, 1998.

- [6]陈襄. 古灵先生文集[M]. 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
- [7]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8]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9]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10]孟棻. 本事诗(历代诗话续编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刘敞. 中山诗话(历代诗话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2]洪迈. 容斋随笔(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3]任渊. 后山诗注[M]. 四部丛刊本.
- [14]任渊. 山谷内集诗注[M]. 四库全书本.
- [15]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6]九家集注杜诗[M]. 四库全书本.
- [17]厉鹗. 宋诗纪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8]张綖. 杜工部诗通[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册).
- [19]魏泰. 临汉隐居诗话(历代诗话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0]王文诰.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5.

(责任编辑 李静丽)